



古文字与出土文献研究丛书

曾宪通 主编

曾宪通 著

古文字与出土文献从考

中山大学出版社





古文字与出土文献研究丛书

曾宪通 主编

曾宪通

著

古文字与出土文献从考



· 广州 ·

中山大学出版社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古文字与出土文献丛考/曾宪通著. —广州: 中山大学出版社, 2005.1

(古文字与出土文献研究丛书/曾宪通主编)

ISBN 7-306-02111-7

I. 古… II. 曾… III. ①汉字: 古文字—研究—文集 ②古文献学—研究—中国—文集 IV. ①H121.1-53 ②G256.1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19244 号

责任编辑: 裴大泉

封面设计: 方楚涓

责任校对: 莫文

责任技编: 黄少伟

出版发行: 中山大学出版社

编辑部电话 (020) 84111996, 84113349

发行部电话 (020) 84111998, 84111160

地 址: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

邮 编: 510275 传真: (020) 84036565

印 刷 者: 广东南海系列印刷公司

经 销 者: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

规 格: 787mm×1092mm 1/16 18.75 印张 4 插页 452 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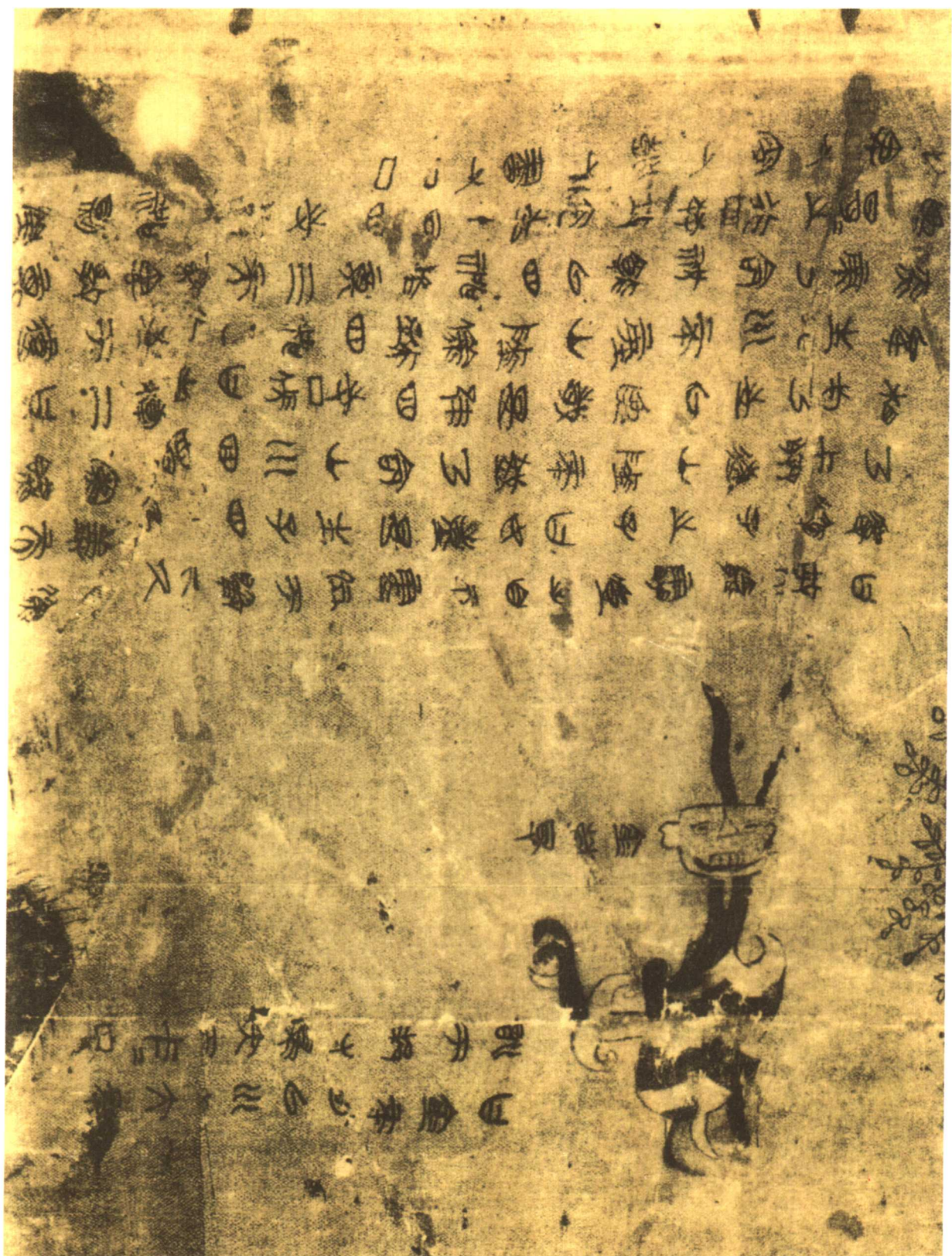
版次印次: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57.00 元 印数: 1-2000 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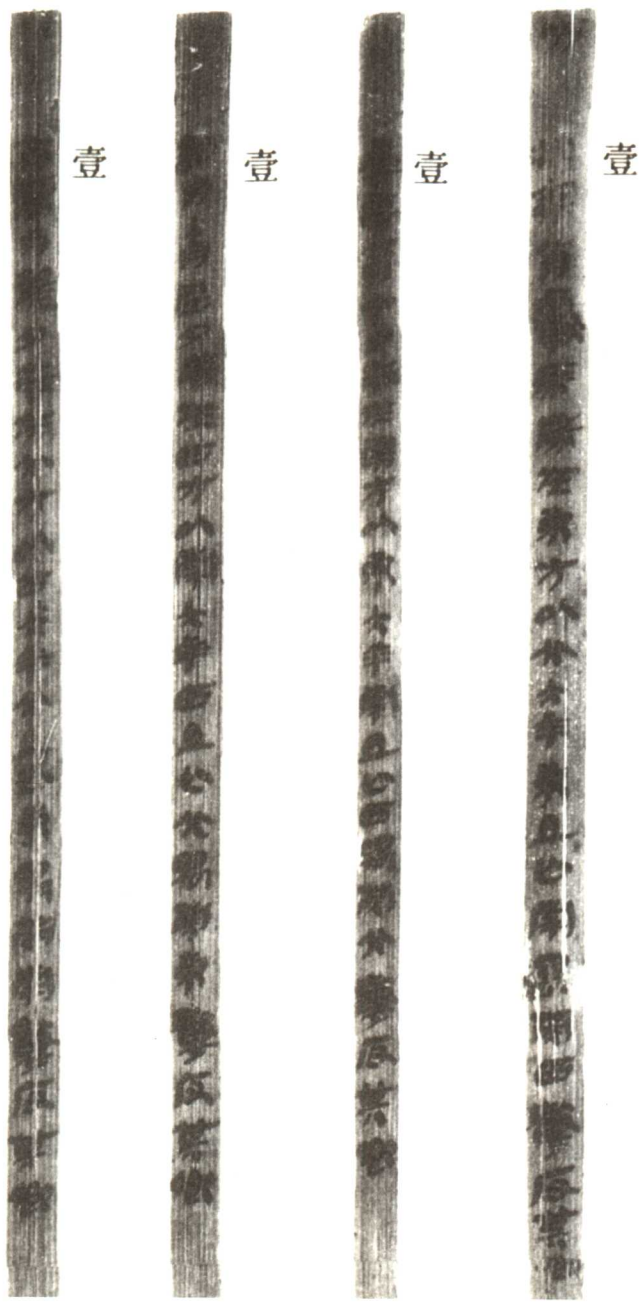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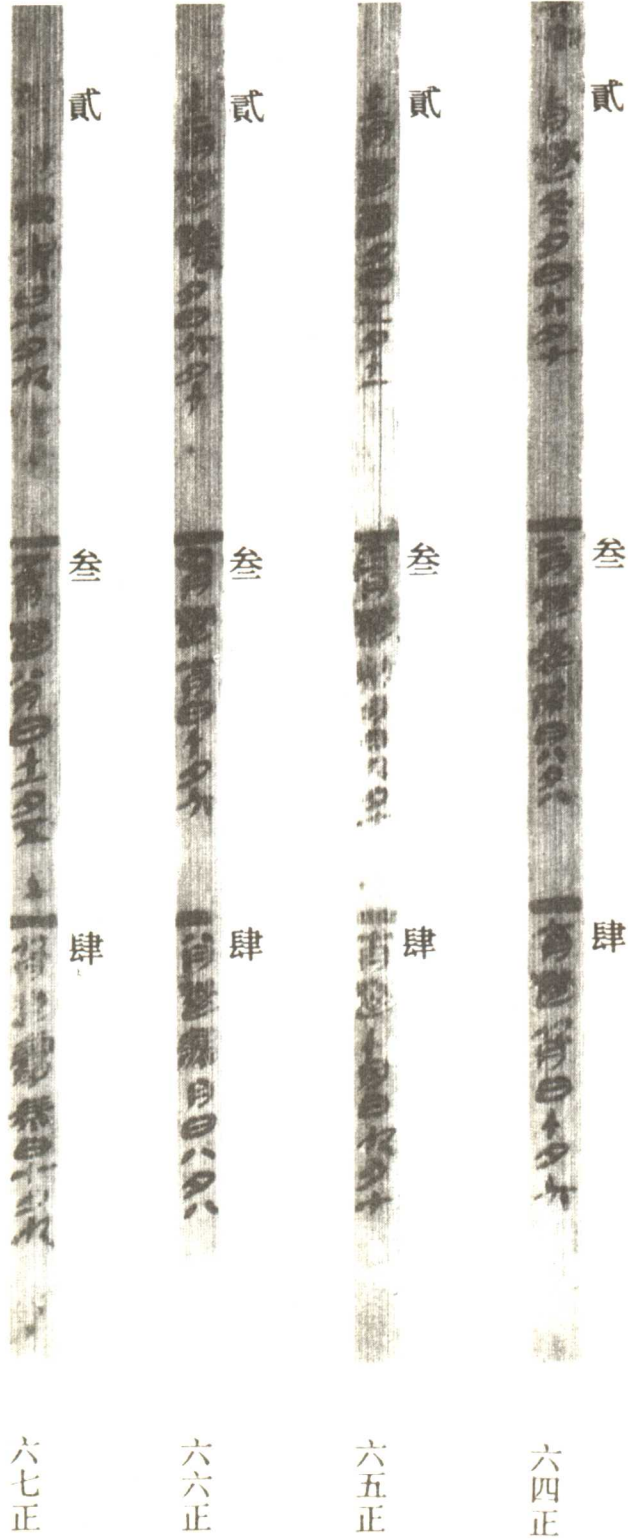
栾书缶



长沙子弹库楚帛书（局部）



《睡虎地秦墓竹简·日书甲种》图版“岁”篇之一



《睡虎地秦墓竹简·日书甲种》图版“岁”篇之二

总 序

曾宪通

本丛书所谓的“古文字”，主要是指通行于先秦时期的古汉字，包括甲骨文、金文和战国文字，兼及秦至汉初的小篆和保留篆书写法的篆隶等；本丛书的“出土文献”，则是特指以这些古文字为载体的地下文献资料。在这个特定的范围内，古文字与出土文献就其本质而言是一对如影随形、相辅相成的专名。然而，从二者的含义有广狭、出现的时间有先后来看，却反映着这门学科的不断发展和演进。

古文字之称肇始于汉代，汉人用以指称汉以前的先秦文字，故又称为古文或古字。根据王国维先生的研究，汉代所谓的古文一般指汉时所存之先秦文字，大抵有四种含义：一指彝器铭文，如《汉书·郊祀志》言“张敞好古文字”，又载美阳得鼎，敞议曰：“臣愚不足以迹古文”，与《说文·叙》谓鼎彝之铭“皆前代之古文”同。二指先秦写本旧书，如《史记》所记秦柱下和石室金匱之书，以及《五帝德》、《帝系姓》、《孔氏弟子籍》和《春秋》、《国语》、《春秋左氏传》等，都是先秦六国遗书。三指孔子壁中书，如《说文·叙》记亡新“六书”，一曰古文，“孔子壁中书也”。四指古文经学派，如《汉书·地理志》凡地名下说解云“古文以为某”者，此处古文非以文字言而以学派言之也。其中一、二项皆指先秦古文字，第三项指壁中书的书体，第四项则是由于研究壁中书的古文经而形成的古文经学派。可见古文字即古文之名，由原本指文字、书体之名，引申之而为学派之名。但综观有汉一代，彝器铭文仅美阳所出尸臣鼎等少数记载而已；许慎《说文·叙》中虽提及“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”，然许氏不能一一目验，又无拓本可致，故《说文》全书并未曾征及铭文一字。及至东汉，古文一名遂由壁中书所专。其后魏正始始刊立石经，中有古文。晋太康二年有汲冢竹书出土，其性质类于壁中书，亦属古文一系。至北宋初年郭忠恕集古文七十一家成《汗简》一书，随后夏竦又增益之成《古文四声韵》传世。由此可见，自汉至宋古文字概称为古文，乃指汉人所传的先秦写本及其辗转传抄的先秦文字，今人谓之传抄古文，是为古文字含义的第一时期。

在这一时期中，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界限并不十分清楚。所谓出土文献，是指因种种原因埋藏起来而被重新发现的文献资料，与前代未被埋没相传至后世的传世文献有所不同。汉初上离秦始皇焚书坑儒未远，典籍异常匮乏。汉高祖戎马一生，关心的是打天下和坐天下的事。至惠帝始解除挟书之令，武帝更开献书之路，建藏书之策，置写书

之官。到西汉末年，社会上收藏的古书便逐渐多了起来。主要来源有三：一是发自中秘，如毛氏《诗》、费氏《易》、左氏《春秋传》等；二是得自孔壁。如《尚书》、《礼记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等；三是献自民间，如北平侯张苍献《春秋左氏传》等。按照后人的观点，发自中秘者应属于传世文献，得自孔壁者应属于出土文献，献自民间则二者兼而有之，它们都属于汉人所见的古文经，而与当时流行的今文经有所区别。可是这些古文经的价值，只是到了刘向父子校理中秘书时才被发现的。自此形成了贯穿整个汉代学术史的古文经和今文经的学派之争。对于古文经学派而言，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是没有本质差别的；而对于今文经学派来说，更加不会去深究二者之间的异同。由此可见，早期的出土文献指的是汉人所传的古文经，它实际上涵盖了传世的先秦写本和被发掘出来的先秦写本在内，《说文》中的古文，当是来源于这些先秦写本的文字，而魏三体石经的古文和郭忠恕、夏竦书中的古文，则是这些先秦写本所用文字的变体。

第二个时期开始于宋代直至清末。这一时期，古文字之名基本上为“钟鼎彝器款识”或“吉金文字”所代替，前者又称为“钟鼎文”，后者则简称为“金文”，并且沿用至今。这一时期的出土文献比较集中在青铜器的图文方面，大体上有三种类型：一是摹录青铜器的图像和文字，如《宣和博古图录》和乾隆“四鉴”等。二是专门集录青铜器铭文，如薛尚功《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》、王隸《啸堂集古录》、阮元《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》、吴式芬《攔古录金文》、吴大澂《窆斋集古录》和刘心源《奇觚室吉金文述》等。三是仅有器名、释文或跋语的，如欧阳修《集古录跋尾》、赵明诚《金石录》、郑樵《通志·金石略》，以及散见于宋人的笔记、小说等。但这种形式只见于早期，后来便十分罕见。北宋是我国金石学勃兴的时期，由于社会稳定，经济发展，带来了思想的活跃和文化的繁荣，士大夫阶层中收藏、鉴赏和研究古代器物的风气便盛行起来。经过北宋庆历之际理学思潮和经学流派的洗礼，古器物的研究由文字而及于礼制和史实。又经清初乾嘉朴学的影响和“小学”研究的推动，文字由字形的辨识和字义的训释而及于铭文的通读。至晚清同光时期，潘祖荫、陈介祺鉴别精严，吴大澂、刘心源精于字形辨析，方濬益、孙诒让精通文字、音韵、训诂，且熟悉典籍，他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传世典籍与出土文献相印证，获得了很大的成功。这些都为古文字和出土文献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

第三个时期是自 20 世纪开始至今，以清末殷墟发现甲骨文为契机，古文字和出土文献的研究走上了全面成熟的发展道路，在纵深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飞跃进展。具体表现在“古文字”这一概念有了明确的对象和范围，从出土材料和研究成果来看，已逐渐形成了殷商周初甲骨文、先秦青铜器铭文和战国文字（含传抄古文）三个分支，以及秦至汉初保留篆隶写法的简帛文字。同前两期比较，第三期的古文字和出土文献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。

首先是出土的古文字资料空前丰富。如前所述，汉人所见的古文字资料以先秦写本的古文经为主，自宋至清则以彝器铭文为大宗。20 世纪以来所发现的古文字材料，则是以往任何时候都无法比拟的。虽然出土的陶符、陶文是否属于汉字的原始阶段尚存在争议，但自商代晚期经西周、春秋、战国直至秦代和西汉前期，在考古年代学上的每个时期，都有以当时书写材料为代表的文字资料发现，已构成一个以象形、表意为基础的

古文字到以表意、表音为主体的近古文字及其向篆隶过渡的发展系列。从这个系列中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，汉字形成体系之后从古文字发展到今文字的整个过程，中间没有任何缺环。这些完备的资料正是我们从事研究工作最重要的物质基础，是十分难能可贵的。

第二是科学的识字水平大大提高。我们应当承认，西汉上离先秦未远，汉人认识古文字的水平应当是很高的，张敞对尸臣鼎所作的三十二字释文，今天看来仍基本正确，就是明证。宋清两代对古器物学的研究有许多独到的见解，但识字水平则远不如汉人。由于受到当时理学和经学的影响，过分追求义理而又缺乏阙疑的精神，在许多重要的关键字还来不及正确释读的情况下，便急于联系经传，随意发挥，结果难免流于比附。直至晚清吴大澂、孙诒让开始用偏旁分析法和历史考证法考释古文字，才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。20世纪上半叶唐兰先生等一批古文字学家，自觉运用吴、孙之法而加以发扬光大，获得很大的成功。新中国建立以来，随着新材料特别是战国文字材料的不断涌现和旧资料的系统刊布，科学的识字方法经过实践的不断验证已为多数学者所确认和掌握，学者群中整体的识字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。现在，一批批的新材料一经公布，经过一个“争议期”的热潮之后，表层次的识字问题一般都可以得到解决，属于深层次的问题则需要更多的研究和证明。

第三是出土古文字材料的时代性和地域性更加明确。汉人对古文字资料完全没有时代观念，今文经学派以为“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”，错误地认为古今文字一成不变，不可改易。古文经学派虽然重视先秦写本的材料，但对古文的看法却相当含混。只是到了王国维将它与出土的战国文字相比较，发现他们原是“一家之眷属”，并指出其为战国时的“东土文字”之后，关于传抄古文的时代性和地域性才明确起来。20世纪30年代，郭沫若作《两周金文辞大系》，通过标准器系联法将大量传世和新出的青铜器编联起来，使宗周与列国的金文材料有了明晰而系统的时空序列。建国以来，研究甲骨文的学者首先将甲骨卜辞的分期断代研究作为第一要务，进而推及整个古文字学科的各个领域，使古文字资料的时代观念更加明确。而大批经科学发掘的出土资料，更大大丰富了分期断代标准的科学性。随着战国文字资料的大量涌现，战国文字的分域研究也盛行起来。现在，一有新材料发现，学术界首先关注的是其年代和地域的问题。同一道理，如果一种古文字资料的时地问题未解决，就会成为学界争论的焦点，甚至会影响到它作为科学研究的价值。这已成为当前学界的共识。

第四是对出土文献的综合研究正在形成。出土文献的综合研究包括两个层面，一是王国维过去提出的“二重证据法”，即以“地下之新材料”印证“纸上的材料”，主要指用地下发现的甲骨文、金文和实物资料，来证明古书上的记载。并预期“中国书本上的学问，有赖于地底的发现”。20世纪70年代以来，由于地下发现的文字资料越来越多，特别是见于竹帛的古书越来越丰富，故有学者提出将地下发现的文字资料同遗址、遗物等加以区分的“三重证据法”。这样，文献学的成分就更加突出了。第二个层面是对出土的文字资料分别从历史、哲学和语言文字的不同角度进行综合的研究，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度，构建人类早期的文明史。这当然是一项具有战略眼光的创举。但是这项基础工程的基础工作就是语言文字学自身的本体研究，即注重从古文字的字形入手，联系

词的音义，清楚而准确地阐释出土文献的内涵，进而揭示出土文献在思想、历史和文化等方面的意义和价值。这种综合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界共同努力的方向。

为了对古文字和出土文献进行语言文字学的本体研究，我们在平时研习和治学的过程中，比较自觉地强化用语言文字学、文献学和文化学的意识去审视出土文献，并且形成了若干专题，进行比较系统和深入的探究，先后完成了若干专篇。在中山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，计划以丛书形式结集出版，名之曰“古文字与出土文献研究丛书”。这套丛书的名目分别是：

- 《古文字与出土文献丛考》（曾宪通）
- 《简帛典籍异文研究》（吴辛丑）
- 《马王堆天文书考释》（刘乐贤）
- 《战国竹书研究》（杨泽生）
- 《战国楚金文形体和词汇综合研究》（张连航）
- 《金文考释的历史考察》（裴大泉）
- 《古楚语词汇研究》（谭步云）
- 《战国秦汉简帛词语通释》（陈伟武）
- 《秦至汉初简帛文字研究》（黄文杰）
- 《秦及汉初句型研究》（郑刚）
- 《古本〈尚书〉文字研究》（林志强）

总计有十一种之数。笔者希望，这套丛书能够在两三年内陆续出齐，以作为自己多年来同友生们一起切磋学问的回顾，但更重要的是为了前瞻，为了展示年轻人的阶段性成果以迎接新世纪的挑战。在新材料不断涌现的今天，正是年轻人生逢其时的大好机遇，时代的重任正历史地降落在新一代人的肩上。因此，要求年轻人在原有的基础上积极进取，勤于探索，勇于开拓，敢于站在前人的肩膀上，攀登新的高峰！

2002年9月于珠江南岸康乐园



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总序 | 曾宪通 (1) |
| 谈“文”说“字”话源流 | (1) |
| “作”字探源 | |
| ——兼谈“未”字的流变 | (5) |
| 释“鳳”“皇”及其相关诸字 | (16) |
| 说繇 | (23) |
| 从曾侯乙编钟之钟虞铜人说“虞”与“業” | (32) |
| 楚文字释丛 | (41) |
| 楚帛书文字新订 | (49) |
| 战国楚地简帛文字书法浅析 | (56) |
| 三体石经古文与《说文》古文合证 | (66) |
| 敦煌本古文《尚书》“三郊三逋”辨正 | |
| ——兼论遂、述二字之关系 | (76) |
| 说“蹶”“蹶”及其它 | (81) |
| “高”及相关诸字考辨 | (85) |
| 去盍考辨 | (91) |
| 从“子”字族群论及字族的研究 | (94) |
| 从“虫”符之音读再论古韵部东冬的分合 | (101) |
| 再说“虫”符 | (107) |
| 古文字资料的释读与训诂问题 | (115) |
| 宋代著录楚公逆钟铭文补释 | (124) |
| 吴王钟铭考释 | |
| ——宋·薛氏《款识》“商钟四”新解 | (131) |
| 吴王光编钟铭文的再探讨 | (145) |
| 关于曾侯乙编钟铭文的释读问题 | (164)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论齐国“遷盟之玺”及其相关问题····· | (181) |
| 《周易·睽》卦卦辞及六三爻辞新论····· | (193) |
| 《周易·离》卦卦辞及九四爻辞新论····· | (197) |
| 包山卜筮简考释····· | (202) |
| 长沙子弹库楚帛书与帛画之解读····· | (211) |
| 秦駉玉版文字初探····· | (222) |
| 睡虎地秦简日书《岁》篇疏证····· | (230) |
| 试论银雀山汉墓竹书《孙子兵法》····· | (243) |
| 居延汉简研究二题····· | (253) |
| 容庚先生和他的颂斋藏器····· | (259) |
| | |
| 明本潮州戏文疑难字试释····· | (271) |
| 明本潮州戏文《金花女》之语言学考察····· | (279) |
| | |
| 后记····· | (288) |


谈“文”说“字”话源流

什么叫文字？用现代科学的符号观来考察，文字应是记录有声语言的书面符号体系。由于语言传播思想的最小单位是词，而词又是语音和意义的结合体，所以，符号记录语言的实质，就是通过一定的形体，将语言里的词变成书面的符号：人们通过一系列的形体，按照词的顺序，将有声语言排列成线性的符号，有条不紊地记录下来。这样，口头上稍纵即逝的语音，就可以借助文字符号的记录而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，使之能够传诸异地、留诸异时。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文字。

然而，文字这个名称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，先秦时代管文字或称为“文”，如《左传》“夫文止戈为武”，“故文反正为乏”；或称为“名”，如《仪礼·士聘礼》：“百名以上书于策，不及百名书于方”；或称为“书”，如《韩非子·五蠹篇》：“古者苍颉之作书也”，等等。这里的文、名、书，皆指文字。《说文》云：“文，错画也，象交文。”许慎根据小篆的形体，把“文”解释作纹饰，即色彩交叉错杂的意思。但“文”更古的字形是像人胸前刺有花纹，甲骨文和金文分别作、，正像在人体上画图的“纹身”之形。《墨子·公孟篇》云：“越王勾践剪发文身，以治其国。”可见古代确有“文身”的习俗，而古“文”字正像纹身之形，当是“纹”字的初文。由此可知，称文是就文字的形体而言的。《说文》又云：“名，自命也。从口从夕，从夕者冥也，冥不相见，故以口自名。”意思是，古人夜间互相看不见，只靠声音来辨别自己的名字。可见把文字叫做“名”，是就字的读音而言的。《说文》中有两处提到“书”：一在“聿”部，云“书，箸也，从聿者声。”一在《叙》中，云“书者，如也。”段玉裁注：“谓如其事物之状也。聿部‘书者箸也’，谓昭明其事。此云‘如也’，谓每一字皆如其状。”今按，许慎训为“箸也”的书，当指著作，“箸于竹帛谓之书”，信阳和郭店楚简凡“书”字皆写作“箸”，可以为证。而许慎训作“如也”的书则指书写，犹今之言“依样画葫芦”是也，实与绘画无异。甲骨文有字，论者或以为是古“画”字（王国维），或以为是古“规”字（郭沫若），或以为“肆”之初文，字正像人执笔习画之形，故又读为画（丁山）。所论具体是哪个字虽有不同，但此字与绘画密切相关则毫无异议。中国书画自古同源，依样画葫芦的书，与执笔习画之（肆），形既相近，义亦相属，古为一字是很有可能的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古代书、箸同字，而箸字说文训作“饭馞也”，《通俗文》云：“以箸取物曰馞”，今谓之筷子。闽南话今仍沿袭古称，叫筷子为“箸”。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曾

经指出，古人作书画运笔与吃饭用筷子密切相关，所以，使用筷子与使用毛笔有着相同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渊源。由此可见，先秦称文字为书者，当是就执笔书写而言的。总而言之，称“文”称“名”或称“书”，三者之间的侧重点虽有不同，但都从不同的角度说明文字是形、音、义的结合物，这也就是文字符号最本质的特征。

那么，什么时候才开始用“字”这个词来指称作为语言的书面符号呢？从出土资料来看，甲骨文未见“字”字，金文“字”字或用作子，如梁其簋“百字千孙”即“百子千孙”；或读为慈，如余义钟“字父”即“慈父”。金文常见表示月相的“既生霸”，吴王光鉴作“既字白”，“字”义同生。睡虎地秦简有“人字”篇，是根据人生子的时辰以占吉凶，“字”的意义为生育，同于《说文》（详下文），均未赋予书写符号的涵义。再从传世文献方面来考察，顾炎武《日知录》上说：“春秋以上言文不言字”，只是到了战国晚期，才有专指书写符号的“字”字出现。江永《群书补义》指出：“其称书名为字者，盖始于秦，吕不韦著《吕氏春秋》，悬之咸阳市曰：‘有能增减一字者，予千金。’”从江永的话来看，吕不韦时的“字”既可用于布告，说明它并不是在小范围内的专门场合使用，已是能为一般民众所理解和接受的普通用语了。及至东汉郑玄为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和《论语》作注，凡遇到有关“名”的说解时，都一律指出：“古者曰名，今世曰字。”可见，用“字”来指称书写符号，到秦汉时期已普遍流行了。

可是，人们为什么会把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称为“字”呢？《说文·子部》云：“字，乳也。从子在宀下，子亦声。”按照《说文》的义例，凡“亦声”字的声符往往兼义，说明以子为声符的“字”字，其实际意义必然与“子”密切相关。段玉裁注解：“人及鸟生子曰乳，兽曰产，引申之为抚字，亦引申之为文字，《叙》云‘言孳乳而浸多也。’”可见，“字”的构形为子在宀下，本义是指在家里生儿育女的意思，《山海经·中山经》有“女子服之不字”句，郭璞注：“字，生也。”《广雅·释诂》亦云：“字，生也。”王充《论衡·气寿篇》：“妇人疏字者子活，数乳者子死。”“疏字”与“数乳”对文，意思是说，妇人生小孩如果间隔的时间长的话，所生的孩子成活率就高；如果妇人频密地生小孩，所生的孩子就容易死掉。可证字的古训乃指生育之生。上面提到的秦简《日书》甲种有“人字”占一篇，是由五支竹简组成的两个形，分别于两个人形之首、颈、奎、腋、手、足、外等部位，标以春、夏、秋、冬及子、丑、寅、卯等十二支字样，释文云：“人字其日”云云，可知十二支是指出生的时辰。占文云：“人字其日在首，富难胜也，”是说人生子，其出生的日辰（即十二支之一）在人形的头部，这孩子将会成为富豪。余仿此。如云“在手者巧盗”，“在颈者贵”，“在足者贱”，等等。其中有一“在外者奔亡”颇为费解，刘乐贤君根据友人陈新的提示，释外为间字古文之省，读为肩，就文从字顺了（见刘著《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》）。简 879 下段有“女子以巳字，不复字”的字样，意思是说，女子如果在“巳”日生小孩，终身就不再生小孩了。秦简《日书》据同墓出土的“大事记”所载，其年代当在秦始皇三十年（前 217）。《日书》是一种继承性很强的传统择日通书，其年代当在此以前，有可能早到战国晚期之际，约与吕不韦的年代相当。由此可见，“字”字作为“生子”义与作为“书写符号”义在战国晚期至秦汉时期两者是并行不悖的。

然则“生子”义的字与“书写符号”义的字二者有什么关系呢？让我们看看许慎对

文和字的解释便可明白。许慎在《说文·叙》中说：“苍颉之初作书也，盖依类象形，故谓之文；其后形声相益，即谓之字。字者，言孳乳而浸多也。”按照许慎的说法，依类象形之“文”是苍颉造的，而形声相益的“字”则是由“文”所孳乳衍生出来的。由独体之“文”孳生出合体的“字”，犹如人类生儿育女那样，不断孳生繁殖而来的。宋代郑樵在《六书略》中说得更加明白。郑氏指出：象形、指事为独体之文，文有子母，母主义，子主声，二母（即义+义）为会意；一子一母（即义+声）为谐声。郑樵这里所说的，是指形与形相益的会意字和形与声相益的谐声字，也就是许慎所谓的“形声相益谓之字”了。无论从出土材料还是传世文献看，战国秦汉是汉字大量繁殖的时期，而新增加的字，几乎都是会意、形声一类的合体字，尤其是形声字所占的比例更大。字的本义既然是生儿育女的意思，那么，由独体的文产生出大量合体的字，就像人类繁衍后代一样，是通过不断孳乳的办法来完成的。在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，人们用本义是生育繁衍的“字”来指称孳乳出来的新符号是再恰当不过的了。这样一来，作为生儿育女的“字”，同作为新增符号的“字”便重合起来了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字原有生儿育女的意义便慢慢地淡化，并最终为书写符号这一意义所取代。所以，把书写符号称之为字，一定是在新的合体字大量涌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，这才是战国秦汉时期把书写符号称之为字的真正原因。

至于文和字什么时候才连用成复合词的文字呢？就目前的资料所见，“文字”一词最早见于秦始皇的琅邪刻石“书同文字”。按照许慎和郑樵的说法，文和字分开来说是有区别的，即所谓独体为文，合体为字。然而在实际应用中，其实并没有严格的区分，如《左传·昭公元年》：“于文皿虫为蛊”，《闵公二年》：成季生“有文在其手曰‘友’”，“蛊”和“友”都是合体的会意字，而称文不称字，可以为证。从汉语词汇发展的历史来看，文和字连称为文字显然与词汇的复音化有关，随着汉语词汇复音化的趋势越来越加强，文多用于文章、文辞、文采等场合，由文和字组成的复合词文字，用来取代单音词的文或字就更加自然而越来越普遍了。文字之称既行，过去的各种称法也就退居第二位，甚至弃而不用了。像名、字、文、书等单独称法，除了在《名原》、《字说》、《文始》和《殷墟书契》一类书名中仍可见到之外，文字一词已成为泛指语言书面符号的通称了。

以上是我们根据传世文献和出土材料探讨了“文字”一词的源流，从中可以看到它在历史上演进的轨迹。文字学是关于文字产生、发展和演进的学问，我们在进行文字学教学的过程中，要尽可能联系汉字的源流，讲清文字学的原理，厘清汉字发展的历史和现状，这将有助于启发学生学习的兴趣，使学生改变“囫圇吞枣”的学习方式，养成“咬文嚼字”的习惯，使之对文字的点画结构不但知其然，而且知其所以然。汉字的历史源远流而流长，汉字源流实际上包含着两个层面：一个是汉字作为整个符号体系的层面，有着自身的源和流，包括汉字的起源，汉字造字法的形成和演进，汉字形体从古文字发展到今文字等，通过源流的例证阐明形、音、义相互制约的条件和相互推动的规律；另一个是作为个体文字符号的层面，在汉字的世界里，几乎每个字都有自身发生和演进的历史，我们必须利用古汉语和古文字的材料把它理清。例如上面提到的“文”和“字”这两个符号，它们作为古汉语里的两个词，原来都各有所指，随着语词的发展，

它们先后都同记录语言的书面符号挂上了钩，并最终共同组成一个并列复合词，成为代表语言书面符号的通称。像这样的例子，在汉字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几乎是俯拾皆是的。我们有幸生于 21 世纪的新时代，考古的发现和古籍的整理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汉字发展的历史资料，是我们进行文字教学取之不竭的源泉。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些资料，把汉字历史所积淀的丰富的文化内涵揭示出来，使文字学获得新的生机。这应成为我们语言文字工作者从事文字教学应有的共识。

(原载《中国大学教学》2001 年第 6 期)